

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张志洲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国际规则对国际关系的建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815年的维也纳秩序、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和二战后的大国秩序等,主要是通过武力和战争来塑造的,今后的国际秩序将越来越依赖于非武力性质的国际规则来建构。国际规则不仅左右各国间利益分配,而且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并对其国际行为合法性进行评判。因此,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形式。

国际规则话语权是重要的制度性话语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对我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这里虽然强调的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但对这一要求应作拓展理解。其一,国际制度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宗教、环境、卫生、安全、反恐等领域也大量存在。国际制度分为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前者通常体现为国际组织规定和明示的国际协议,后者主要表现为具有制约性的习惯性做法或共识。相对

于前者,后者为“弱制度”。西方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世界卫生组织、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奥委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国际人权公约禁雷运动、达沃斯论坛等著名的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组织及运动、论坛,就是不同领域典型的国际制度。其二,不论是有形的国际制度、还是无形的国际制度,不论是全球性的制度、还是区域性的制度,不论是联合国这样的综合性国际组织、还是国际清算银行这样的专门领域的国际组织,其核心都是国际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国际制度。因此,要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首要的是争取和提高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各国针对国际话语权而展开的竞争,实质上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竞争。举例来说,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最重要的组织,中国加入该组织,是通过国际规则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步骤和举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强权国家,曾试图领头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建立“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这一企图受挫后,奥巴马政府又花大力气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并且明确表示,其意在建立新的贸易规则,“不能允许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竞争的实质。又如,为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变化公约而召开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要达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协定,中间经历了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等多次讨论,旷日持久,直至达成巴黎协定。这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在能源使用与碳减排上应确立什么样的国际规则。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把握增强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着力点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现有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没有主导地位,

总体而言尚缺乏强大的国际规则话语权。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由于多数国际规则的制定已经由西方国家主导完成,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往往要通过通过对既有国际规则的认同来参与国际治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如在国际气候公约的谈判中扮演了负责任大国角色、在区域安全领域主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和发展领域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创建了二十国集团、与东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不断增强的态势。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应针对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话语权战略,明确增强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着力点。

抓住网络空间这一重点领域。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国际规则各不相同;有的领域国际规则相当成熟,改进的空间较小,有的领域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国际规则;有些国际规则影响全局,有些国际规则的影响则局限于较小的范围。要增强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必须抓住重点领域,而网络空间就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影响,但相关国际规则尚不成熟的重点领域。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我国在互联网技术发展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具有后发优势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在相关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较大的话语权。增强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话语权,网络技术力量是基础,线上运行规则是核心,要将线上规则与线下技术力量结合在一起。

用好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中国不能做被动接受者、追随者,而应作为平等的一员乃至成为主角。对于一些不公平的国际规则,要在适当的时机争取修订;对于一些与我相关的新的国际规则的创建,要体现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方方案。而我们能为国际规则的制定作出独特

贡献的一大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增强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是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智慧。例如,对于现有国际规则的修订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要知白守黑、审时度势;在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要顺势而为、以德服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机制时,强调“亲、诚、惠、容”;在制定解决国际争端和利益纠纷的国际规则时,强调兼爱、非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和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等等。

遵循话语权生成的基本逻辑。作为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规则话语权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它同时也遵循话语权生成的基本逻辑。强大的逻辑说服力、公正的价值理念、科学依据和实证材料等,是构成话语权的要素。在增强国际规则话语权问题上,这些要素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中国要力争做到在议题设置上有引导力、在规则制定的讨论中有说服力、对于霸权倾向有回击力、对于质疑有解释力。此外,话语权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综合国力、文化认同、媒体传播、同人们心理期待的契合性以及制度的比较优势等等。增强中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需要深刻把握这些要素与话语权之间的内在联系。

遵循融通中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社会,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点和价值理念往往千差万别。不考虑差异性的国际规则,难以被不同国家和群体普遍认同,也就难以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遵循。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拥有5000多年独特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东方古国,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对于自己的国际角色有特殊的自我定位,对于国际规则制定有特别的诉求。同时,作为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负责任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对国际规则必须有全球视野和开阔胸襟。在国际规则的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我们必须牢记和遵循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作者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实现中国梦,需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夯实中国人民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

中国梦,梦有根。历史上与中华文明并存的一些古代文明,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生命力。惟中华文明能依其自创之内涵保持生机和活力,至今仍岿然屹立。中华民族之根在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无论历史多么遥远、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丢了根,失了魂。纵览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振奋为先导。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劲推动。

文化滋润精神。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对精神世界的关照却相对滞后,甚至出现了精神上的病态。中华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人文理念,正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慎终追远并非要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为了以古鉴今,积德厚德,提醒人们在繁忙浮躁的当下想想根、定定神、稳住脚步找到魂。

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掠夺他人来扩张市场、侵占资源。这造就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同时加深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时代呼唤新的文明,希望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新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适应构建新文明形态的时代要求;构建新文明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以这样的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欺骗谁,而是基于自身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本国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懈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

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我们需要建立新型人与自然关系;面对西方文明强行推广其价值观的霸权主义,我们需要形成新型人与社会关系;面对西方文明对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过分强调,我们需要确立新型人际关系。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开拓出新格局,中华民族一定能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新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叶小文

新旧更替的洪流势不可挡

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丁冰



当今世界,随着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与其他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但各国之间因种种原因,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和矛盾需要协调。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治理规则,往往含有不平等的霸权、剥削和歧视性因素,加剧了世界两极分化,因而受到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抗。

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应引领世界经济朝着消除歧视、霸权,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方向发展,公平合理处理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认真研讨、准确判断,及时提出和推行以“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踏步走出去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既有利于我国同相关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我国赢得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贡献智慧和力量的机会。2016年,我国继9月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之后,11月习近平主席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受到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欢迎。

“澳大利亚人报”称,中国在APEC会议上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主要倡导者”。这标志着在世界经济治理这个大舞台上,我国正逐渐走近中心。有媒体说

得好:“我国过去是买票进场看戏,现在是进场登台唱戏。”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在系统阐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与保护主义相反的主张:“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同时,他还具体论述了新的不同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正当世界各国人民因保护主义抬头而感到前景迷茫之际,习近平主席以宏伟的气魄、坦诚的语言、敢于担当的精神,提出了可行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模式和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方案,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说:“中国国家主席的光临,从某些方面而言,是极具象征性意义的。”

这里所说的象征性意义可以理解:二战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难以继,而不得不代之以落后保守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政策;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旧的经济全球化退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正在兴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旧经济全球化更替的洪流已势不可挡。(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外资退出中国论”是武断的

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热土

罗长远

2.7万多家。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看重长期回报、占据我国所吸收外资主体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增长势头。

从外来来源看,主要外来来源国家和地区依然保持对华投资热情。根据商务部的统计,近年来中国大陆前10位的外资来源地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例在90%以上。“十二五”时期,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金额从1062.8亿美元增加到1186.3亿美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6年,韩国、美国、德国、英国和澳门地区对我国实际投入外资规模分别增长了17.6%、47.9%、73.7%、104.6%和291.0%。

从全球直接投资流动看,我国依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从直接投资流入看,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显示,2012年—2015年,流入我国的外资从1211亿美元增加到1356亿美元,

呈平稳上升的态势。与同是全球热门投资目的地的东南亚相比,我国外资流入增速高于其整体表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吸收外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都更强。从直接投资流出看,2012年—2015年,“亚洲四小龙”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呈大幅波动的状态,增幅最高超过160%、最低时接近-56%。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我国的主要外来来源地,与其对外投资增速相比,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速依然保持在合理区间。

综上所述,我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热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步下降;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相关政策支撑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外资和外贸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外资进入和退出都是正常的。我国经济质量不断提高,必定会带动外资结构发生相应改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外资流入不发生“腾挪”是不现实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

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可以预计,伴随着部分低端外资的退出,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中高端外资进入。

同时也应看到,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调整期,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将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三方面因素:一是全球经济低迷在整体上对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造成了负面冲击,这一冲击在短期内还无法完全消除;二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影响到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流动;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对称性发展,加剧了发达国家资本回流,压缩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空间。上述因素既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又对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在继续为外资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让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有益参考

——《中国经济新方位》简评

关文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著的《中国经济新方位》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紧密结合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新主线、新环

境新趋势、新理念新谋划、新挑战新机遇、新格局新空间等作了较为深入的解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该书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新起点,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

的新起点,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起点,是同世界经济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在此基础上,该书从“怎么看、怎么办、如何干、为谁干”四个

新书评介